

日本的《詩品》學

曹 旭

上海師範大學研究生部

《詩品》在中晚唐之際東漸日本，即對日本的漢詩及和歌產生重要影響。出於對《詩品》詩觀的欣賞，也出於對漢詩、和歌理論建設的需要，日本詩人從天長年間(824-834)開始，到明治(1868-1912)時代，特別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，日本詩人對《詩品》經歷了一個從感性上學習、摹仿、化用，到理性上分析、研究的過程。本文即著眼於這一過程，理清《詩品》在日本的流傳情況，並對日本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現狀作一番勾稽評論，讓中國讀者了解日本的《詩品》學，以取得交流和方法論上的借鑒。

《注詩品》三卷

考察《詩品》在日本流傳的歷史，當追溯到唐大順元年(890)以前。而最饒有興味的，莫過於《日本國見在書目》上的記載。《見在書目》由藤原佐世所撰，書成於日本寬平年間(約890年前後)。其「雜家類」載曰：「《注詩品》三卷。」¹這裏的《詩品》，不可能是唐代司空圖的《二十四詩品》。因為司空圖生於晚唐開成二年(837)，卒於後梁開平二年(908)，從年代和時間上推算，藤原佐世撰《日本國見在書目》和司空圖撰《二十四詩品》也許同時，也許更早；²又，《二十四詩品》不為三卷，故為鍾嶸《詩品》無疑。

有意思的是，《見在書目》除「雜家類」外，其「小學家類」也有下列記載：「《詩品》三卷。」³《詩品》三卷與《注詩品》三卷一樣未著撰人，但兩者均為鍾嶸

¹ 舊鈔本《古逸叢書》之十九(臺北：廣文書局影印，1972年)，頁53。

² 近年來，《二十四詩品》的作者說頗紛歧。陳尙君、汪涌豪以為乃明人僞托；張健又作了進一步的考證，說皆可信。詳見陳尙君、汪涌豪：〈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僞〉，《中國古籍研究》第一期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)，頁39-73。張健：〈詩家一指的產生時代與作者——兼論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〉，《北京大學學報》1995年第5期，頁34-44。

³ 頁24。

《詩品》。藤原佐世把《詩品》三卷歸為小學家，把《注詩品》三卷歸為雜家。由此對兩者的區分，則《注詩品》三卷為注解詮釋《詩品》的著作，屬雜撰一類性質甚明。今檢唐宋以來的各種書目、著錄，均無《注詩品》三卷的記載，則《日本國見在書目》此條記載，正可補中國歷代書志著錄之闕。

《注詩品》三卷作者是誰難以斷定，日本京都大學興膳宏認為，《注詩品》三卷的作者是中國人。因為無論是弘法大師帶回日本的漢籍（以後曾編書目），還是藤原佐世《日本國見在書目》裏的漢籍，多為中國人所撰。我有保留地同意了。因為日本留學生注的可能性再小，卻難排除。

由中國人所注，日本人帶回？還是日本留學生所著？日本歌壇對《詩品》的需要，乃是《詩品》東渡成行第一位的原因。漢詩創作、和歌創作的實踐需要理論指導，從《萬葉集》到紀貫之的《古今和歌集》，《詩品》正是在這種創作高潮中傳到日本的。既然日本歌手想看看齊梁鍾嶸如何評論五言詩，從中汲取靈感，借鑒理論；那麼，清除文字的隔閡，注釋三品的詞句，詮解疑難的典事，闡發其中的妙旨，也就成了歌手的需要和時代的必然。這種必然，使《詩品》有了一部在中土沒有記載過的注本；經歌手和理論家的消化吸收，終以紀貫之為代表，成了為日本和歌建立最早理論框架的出處和背景。⁴

可惜的是，《注詩品》三卷今佚不傳。但《見在書目》證明它存在過。因此，它對我們了解《詩品》在日本的流傳和影響，仍有珍貴的資料價值。

除《日本國見在書目》以外，日本其他書目，如《誠庵文庫目錄》、《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》、《狩野文庫目錄》、《國會圖書館目錄》等，都有《詩品》存在日本、現藏何處的登錄記載。

今檢日本書目中的《詩品》版本，多為中國叢書本。靜嘉堂中的明本，就是收購陸心源皕宋樓中的明代善本。至如《顧氏文房小說》本、《夷門廣牘》本、《格致叢書》本、《漢魏叢書》本、《廣漢魏叢書》本、《續百川學海》本、《五朝小說》本、《增訂漢魏叢書》本、《說郛》本、《津逮秘書》本、《歷代詩話》本、《擇是居叢書》本、《對雨樓叢書》本、《學津討原》本、《龍威秘書》本、《秘書二十八種》本等，則都是中國叢書本而在日本流傳。

此外，一些日本刻的《詩品》版本，只在日本流傳。如日本文政九年（1826）的《吟窗雜錄》本、狩野文庫藏日本元文四年（1739）的《二家詩品》本、近藤元粹的《螢雪軒叢書》本等。

特別是近藤元粹《螢雪軒叢書》本中，遍及上、中、下三品，還逐段逐條地附有許

⁴ 參見曹旭：〈詩品東漸及對日本和歌的影響〉，《文學評論》1991年第6期（1991年12月），頁86-96。

多對《詩品》品語的評論。有些評論雖然瑣碎、輕率，褒貶失當，⁵如卷首「《詩品》三卷，平凡不足觀。然其書尤右，故諸家之選，無不載者。今亦仿輦載之，讀者其諒焉」。所有的評語，除兩條「確論」、「卓見」外，多為貶詞，缺少令人信服的分析。但卻反映了文化傳播和文化吸收中，對異國文化經常一方面吸收，一方面拒斥的情況。

日本的《詩品》研究會

《詩品》研究在日本學術界最令人注目的，莫過於日本學者成立的《詩品》研究會。紀昀《四庫全書提要》、章學誠《文史通義》都將《文心雕龍》和《詩品》並舉，紀昀說：「建安、黃初，體裁漸備，故論文之說出焉……其勒為一書傳於今者，則斷自劉勰、鍾嶸。勰究文體之源流，而評其工拙；嶸第作者之甲乙，而溯其師承，為例各殊。」「嶸學通《周易》，詞藻兼長。所品古今五言詩……每品之首，各冠以序，皆妙達文理，可與《文心雕龍》並稱」。章學誠也說：「《詩品》之於論詩，視《文心雕龍》之於論文，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。《文心》體大而慮周，《詩品》思深而意遠。蓋《文心》籠罩羣言，而《詩品》深從六藝溯流別也。」二家所論，最為有識。鍾嶸《詩品》與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堪稱六朝文學批評史上的雙璧。但是，中、日學者對《詩品》和《文心雕龍》的研究，卻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差異。

在中國，對《文心雕龍》的研究非常熱門。目前已形成「龍學」，擁有「龍刊」，有一支頗為龐大的《文心雕龍》研究隊伍。從版本到文本；從劉勰生平到與儒學、佛學、道學的關係；從《文心雕龍》的「文之樞紐」，到內在的體系和創作論，都有很大的創獲。范文瀾的《文心雕龍注》、王利器的《文心雕龍新書》、楊明照的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》、王元化的《文心雕龍創作論》都是享有盛譽的著作，研究的勢頭方興未艾，有增無減。

但是，與「龍學」的興盛相對照，《詩品》的研究，無論從研究的深度、廣度，研究者的隊伍，受重視的程度，都不能與成為顯學的《文心雕龍》相提並論。從1949年至1984年，除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民國十六年的陳延傑《詩品注》以外，竟無一種新著問世。這種研究的不平衡是非常有趣的。

日本的情況有些不同。從歷史和傳播上說，《文心雕龍》幾乎是與《詩品》同時傳入日本的。與《詩品》一樣，最早提到《文心雕龍》的是弘法大師的《文鏡秘府論》，其《天卷·四聲論》載：「是人劉勰著《雕龍》篇云……」由於下面的文字都轉引自隋

⁵ 《詩品》下品。宋監典事區惠恭條：「謝〔惠連〕曰：『君誠能，恐人未重，且可以為謝法曹造。』遺大將軍，見之賞嘆。」中澤希男《詩品考》說：「《螢雪軒》本作『且可以為謝法曹造遺，大將軍見之賞嘆。』均為誤斷。但《螢雪軒》不僅未覺察到誤斷，反而在書卷眉額上注『敘事缺明了』五字以呵。」其態度可見一斑。

代劉善經的《四聲指歸》，文字與《文心雕龍·聲律》篇也有出入，因此，弘法大師是否看到過《文心雕龍》與是否看到過《詩品》一樣成問題。

最早的登錄是藤原佐世的《日本國見在書目》。其「雜家類」和「別集類」均有「《文心雕龍》十卷劉勰撰」的記載。整個情況與《詩品》十分類似。但兩書對日本文學理論的影響卻不盡相同。

昭和三年(1928)，日本學者土田杏村在《文學的發生》第八章「批評文學的發生及其源泉」中，論述《文心雕龍》影響日本和歌時以為：紀貫之《古今和歌集》序「夫和歌者，托其根於心地，發其花於詞林者也」一語，與其說是源於《詩大序》，不如說是從《文心雕龍》的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」來的。他還說：「《古今和歌集》序既取隨性情所至，自然揮灑的純藝術主義的詩觀，又主張道德主義應在個人德性及孤性及國家政治上發揮效用，後一種思想也許來源於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。因為劉勰的思想就是這樣一種道德主義。」⁶此外，太田青丘也曾論述《古今和歌集》的真名序受到《文心雕龍》〈原道〉、〈明詩〉、〈時序〉、〈比興〉、〈物色〉諸篇的影響。但是，土田杏村也好，太田青丘也好，他們論日本「批評文學的發生」，都是以《詩品》為中心的。《詩品》直接而且大量地影響了日本的批評文學，《文心雕龍》只是附帶的影響。原因也許是日本最早的批評文學是和歌的序言，日本歌的序言易受中國詩的序言的影響，是感情載體的相同，詩騷精神的類似；歷史的集體無意識；或者《詩品》精神與日本民族的審美體驗、詩學精神相契合。⁷不管出於甚麼原因，以《詩品》為主的中國詩論影響日本批評文學的發生是無可置疑的事實。

這使得現、當代的研究也發生變化。日本學者儘管也很重視《文心雕龍》的研究，鈴木虎雄、斯波六郎、戶田浩曉、目加田誠、岡村繁、興膳宏、安東諒等學者都對《文心》進行過卓有成效的研究，取得很大的成績，其中以斯波六郎的《文心雕龍范注補正》、〈文心雕龍札記〉；岡村繁的《文心雕龍索引》；興膳宏、目加田誠、戶田浩曉的《文心雕龍》全譯；以及戶田浩曉的《文心雕龍研究》為重要著作。但是，比起較為正統也較為保守的《文心雕龍》來，《詩品》「吟咏情性」的詩觀和不落俗套，具有獨創性的美學觀念也許更饒興味，為日本人喜愛？使日本學者更有興趣研究《詩品》？

相比之下，中國學者主要強調《詩品》與《文心雕龍》的相同點，而日本學者則往往注重尋找它們的不同點。原載於《吉川博士退休紀念中國文學論集》，後譯成漢語，載於《文藝理論研究》1982年第2期的興膳宏〈文心雕龍與詩品在文學觀上的對立〉一文，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學者對《詩品》與《文心雕龍》的基本看法。

鍾嶸在諸多詩學理論上與劉勰相左；《詩品》與《文心雕龍》在文學觀上對立，不僅只是興膳宏的一家之言，而是代表了許多日本學者的觀點。同樣，林田慎之助在〈鍾

⁶ 筆者譯。

⁷ 參見曹旭：〈詩品東漸及對日本和歌的影響〉。

嶸的文學理念)和《文心雕龍文學理論諸問題》二文中所表現出來的學術傾向也是十分明顯的。但最有意思的是：中國有《文心雕龍》研究會，沒有《詩品》研究會；日本有《詩品》研究會而沒有《文心雕龍》研究會，儘管二者的性質並不完全相同。

不管怎麼說，發起成立《詩品》研究會，是日本對《詩品》研究感興趣最好的證明；它直接形成了日本的《詩品》熱。而研究會人員的分布之廣、研究水平之高，都是空前的。

高木正一《鍾嶸詩品》前言記載說：爲了加快對鍾嶸《詩品》的研究，昭和三十七年(1962)，日本立命館大學教授高木正一和高橋和巳發起成立《詩品》研究會。對《詩品》的字詞、典事、義理、觀念，進行全面的研討。

研究會曾因經費問題一度中斷，後於昭和三十九年(1964)再度召開。參加的學者有：京都大學的吉川幸次郎、小川環樹、清水茂、興膳宏、田中謙二、尾崎雄二郎，東京大學的福永光司，東北大學的村上哲見，神戶大學的伊藤正文、一海知義，廣島大學的小尾郊一、鈴木修次，東洋大學的船津富彥，立命館大學的白川靜、笠原仲二，以及島根大學、名古屋大學等二十多位教授，可謂集中了日本漢學有關方面的精英和新銳。

二十幾位教授在研究上作了分工，根據自己的專長，有的專作詞章訓詁，有的專事文字校勘，有的擅長思辯哲學，進行旨意的闡發，各以己之所長，攻《詩品》之一隅，從不同的角度，對《詩品》進行逐字、逐句、逐行、逐段地研究，然後把所有的成果匯集在一起。

成員小尾郊一說：「第一次《詩品》研究會於1962年在京都的立命館大學召開，目的是爲了撰寫《詩品講疏》。」⁸

對於研究成果的整理，高木正一《鍾嶸詩品》序述之甚詳：

詩論內容由立命館大學的助教玉田繼雄氏錄音，我著手寫記錄稿。因爲有發表的責任，由我漸次地進行整理。從昭和三十九年十月開始，以《鍾嶸詩品疏》爲題，⁹在自己學校的學術雜誌《立命館文學》上連載發表。執筆的還有吉川幸次郎、鈴木修次、伊藤正文、船津富彥、興膳宏諸氏，連同我，共六人。

高木正一在《鍾嶸詩品疏》的基礎上，進一步修改、加工，完成了《鍾嶸詩品》的撰寫工作。由吉川幸次郎介紹，在東海大學出版會出版，標誌著日本學者的《詩品》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。

在《詩品》研究會的成立和討論期間，韓國文理科大學的車柱環、法國法蘭西學士

⁸ 見小尾郊一氏致筆者函。《詩品講疏》，即指在立命館大學《立命館文學》上發表的《鍾嶸詩品疏》。

⁹ 當爲《鍾氏詩品疏》。

院的保羅·戴密微也參加了討論。¹⁰ 因此不妨說，這是一個以日本學者為主，由韓國學者和法國學者參加的國際《詩品》研究會。

遺憾的是，這樣的研究會，竟然沒有一個來自中國的學者參加。更遺憾的是，從昭和三十七年《詩品》研究會成立，到昭和五十三年研究成果的出版，在日本學者奮起研究的日子裏，鍾嶸家鄉卻經歷十年文化動亂；《詩品》及《詩品》的研究者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難。民國十六年和十八年分別出版《詩品注》和《詩品釋》（《詩品講疏》）的陳延傑、許文雨被批鬥致死，陳延傑的家藏明抄本亦毀於劫火。¹¹

日本當代研究鳥瞰

鳥瞰日本的當代研究，可以看出他們非常用功。早在本世紀初，他們對《詩品》的研究即已開始。1909年，兒島獻吉郎的《支那大文學史》中已設有《詩品》和《文心雕龍》的專門章節。對《詩品》和《文心雕龍》加以論述，比較分析。此後青木正兒著《支那文學概論》，同樣對《詩品》十分關注。青木正兒還提出了一些前人從未提出的問題。譬如，他根據《詩品》序和中品沈約條中有「夫網羅古今，詞文殆集」、「嶸謂：約所著既多，今剪除淫雜，收其精要。允為中品之第矣」的話，認為《詩品》之外，鍾嶸還另有一本五言詩選，《詩品》只是詩選的附錄。

青木正兒也許是受摯虞有《文章流別志論》和《文章流別集》，李充有《翰林論》和《翰林集》的影響，而《文章流別志論》和《翰林論》正是《文章流別集》和《翰林集》的附錄。儘管根據元《群書考索》和《稗編》等引文，「詞文」，當作「詞人」，指五言詩人；《詩品》之外，並無《詩品集》。中澤希男《詩品考》也已指出：「整部《詩品》，找不出鍾嶸曾編選過五言詩的佐證。」「下品·宋傅亮條：『今沈特進選詩，載其數首，亦復平矣』，就是有力的反證。如果不是那樣的話，鍾嶸在評傅亮時，為甚麼要以沈約編的詩選作資料呢？」但不管怎麼說，青木正兒問題的提出，是有創造意義的。

二十世紀五十年代，在《詩品》研究會成立以前，日本的《詩品》研究，主要以中澤希男、高松亨明二人為代表。其中，中澤希男的《詩品考》；高松亨明的《詩品詳解》、《鍾嶸詩品校勘》被推為力作。

研究會成立期間，許多學者共同研究；研究會結束以後，一部分人的成果融化在以《詩品》研究班名義發表的《鍾嶸詩品疏》裏，此後不再繼續研究下去；另一部分人則仍獨立地進行的研究，取得了可觀的成果，這使《詩品》研究出現了一個高潮。從1949年到1985年，日本學者與中國的研究相比，竟在著作的數量上佔著優勢。

¹⁰ 見高木正一：《鍾嶸詩品·前言》。

¹¹ 筆者赴江蘇、山東等地調查，此情況由陳延傑之子陳鴻詢親口相告。

以下從校勘、注釋、論述幾方面對日本《詩品》學的主要成果作一番瀏覽：

一、〈詩品考〉

中澤希男著。昭和三十四年(1959)6月刊於《群馬大學紀要·人文科學編》第7卷第6號。其內容分三部分：第一部分是「總記」；第二部分是「校訂」；第三部分是「注解」。「總記」考證《詩品》的書名、著作的年代、《詩品》的版本、《詩品》的序言、《詩品》的人數；「校訂」分《詩品》序和上、中、下三卷，以明代毛晉《津逮秘書》本為底本；校以《吟窗雜錄》、《顧氏文房小說》、《廣漢魏叢書》、《格致叢書》、《歷代詩話》、《全梁文》諸本；又參考《南史·鍾嶸傳》、《文鏡秘府論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石林詩話》等書裏的重要引文；「注解」則既注語詞，也注出處，考證嚴密，論斷精詳。其校勘、考證的成果多為日本學者所引用，在日本當代《詩品》研究上有首開風氣的作用。

二、〈詩品詳解〉

高松亨明著。昭和三十四年(1959)12月由弘前大學文理學部中國文學會印刷發行。此書亦分兩部分：第一部分為翻譯、注解；第二部分為考證研究。

前有「緒言」，追述留學中國、私淑於郭紹虞及研究鍾嶸《詩品》的經過；注釋兼有校勘，亦以明人毛晉《津逮秘書》本為底本(《詩品》序以《梁書·鍾嶸傳》為底本)；注釋的方法是，先列原文，原文後分列「校異」、「要旨」、「語釋」、「通釋」(原文翻譯)、「參考」諸項，注解兼採陳延傑《詩品注》、古直《鍾記室詩品箋》、許文雨《詩品釋》、杜天縻《廣注詩品》諸作中的精義；疑難之處，又請教郭紹虞，將他解釋疑難的覆函稱為「郭書翰」，專列一條。

研究部分由「鍾嶸的傳記」、「序的位置」、「源流考」、「品第考」、「陶潛的品第和源流」、「沈約的品第和源流」第十部分組成。未附日本國會圖書館內閣文庫藏《吟窗雜錄》本《詩品》書影、五十音順人名索引。此書兼採眾長，融詞章、考據、義理為一體，多有發明之處，故出版後為當時的學術界所矚目。儘管兩年後，入矢義高在他的書評中對此書的誤譯和不足之處提出了批評，但此書首次把中、日兩國的研究成果匯為一軼，有開創之功，也是當時較為優秀完善的注釋、研究著作。

三、〈鍾嶸詩品校勘〉

高松亨明著。昭和四十年(1965)刊於弘前大學《文經論叢》創刊號(11月20日發行)。

前有「凡例」五則，說明校勘的情況。校勘仍以《津逮秘書》本為底本，與《詩品詳解》同。用以校勘的有《對雨樓叢書》、《硯北偶抄》、《歷代詩話》、《全梁文》、《吟窗雜錄》諸本，參考《梁書·鍾嶸傳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石林詩話》、

《詩人玉屑》、《文鏡秘府論》等，在中澤希男《詩品考》和《詩品詳解》校勘的基礎上又進了一步。精詳細密，多有發前人未發之處。然自謂郭紹虞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所列二十四種《詩品》版本，「筆者未見的有《天都閣藏書》本、《四十家小說》本、《詩觸叢書》本、《談藝珠叢》本、《玉雞苗館叢書》本、《諸子百家精華》本、《四部備要》本、《一希筆存》本等八種。又郭氏列舉《詩品》研究著作七種，其中陳衍《詩品平議》搜求未得。在未見資料甚多的情況下，終無勇氣妄出《詩品》之定本」。¹²

四、《鍾氏詩品疏》

詩品研究班著。這是《詩品》研究會研究的重要成果，共分八期，刊於立命館大學《立命館文學》第232號(1964年10月)、第241號(1965年10月)、第268號(1967年10月)、第272號(1968年2月)、第282號(1968年12月)、第300號(1970年6月)、第308號(1971年2月)、第309號(1971年3月)。

由此，《詩品》研究在日本形成了一個熱點，劃出一條界線；在版本文字、典章訓詁、義理考據諸方面，都取得重要的進展，為以後的研究提供了方便。

五、《詩品》

興膳宏著。昭和四十七年(1972)出版，收入朝日新聞社發行的《中國文明選》第十三卷《文學論集》(與嚴羽《滄浪詩話》合卷)。

首有《文鏡秘府論·天卷》所引《詩品》品語書影；次為「解說」、「解題」各一；「解說」討論中國古代詩論，闡述鍾嶸和嚴羽的文學觀和美學思想。「解題」論鍾嶸《詩品》產生的淵源、理論體系、地位影響等。注釋形式是先錄原文，隨後翻譯，再加通箋。由於著者參加過《詩品》研究會的討論，故譯文精密準確，箋注時多有發明，足以啟迪後人，在日本學術界有相當影響。末附「文學論集關係年表」、「《詩品》語辭、人名五十音順索引。此書出版後，法國陳慶浩《詩品集校》導論曾讚譽為「今日日本最好之《詩品》疏釋本」。

六、《鍾嶸詩品》

高木正一著。昭和五十三年(1978)3月以日本文部省科研經費由東海大學出版。

卷首「前言」，敘述發起成立《詩品》研究會的緣起和成書的過程。次有凡例六則，說明版本的選擇、校勘的處理；凡例後為「解題」，論鍾嶸家世、生平、社會背景、理論淵源、評論標準、文學觀念等等。全書以通箋的形式，先注後校，旁徵博引，

¹² 見高松亨明：《鍾嶸詩品校勘·前言》。

頗多創獲。末附高木正一撰〈鍾嶸的文學觀〉、日本文政九年版《吟窗雜錄》本《詩品》、《詩品》語辭、五十音順人名索引。

此書在吸取中國、韓國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，綜合了日本二十多位研究者的看法，是目前國際上較為理想完備的注本。故參加《詩品》研究會的伊藤正文說：「〔此書〕注釋詳盡縝密，世評極高。」¹³ 高松亨明也說：「《鍾嶸詩品》研究的深度和廣度，都超過了拙著《詩品詳解》。」¹⁴ 岡村繁在〈日本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概況〉一文中認為：「今後日本的《詩品》研究，將以這本《鍾嶸詩品》為有力的參考文獻吧！」¹⁵

校勘、注釋，勒為書著的以外，《詩品》的單篇論文亦有相當數量，令人注目。論文大致上分五類：

第一類是研究鍾嶸生平思想及文學觀念的，以高木正一的〈鍾嶸的文學觀〉（《二松學舍大學論集》創立百周年紀念，1977年10月）和林田慎之助的〈鍾嶸的文學理念〉（《中國文學論集》，1978年6月）為代表。

第二類論《詩品》的品語源流，涉及的作家、作品，以現代的眼光重評《詩品》評論過的作家、作品，得出鍾嶸評論是否正確的論文。比較集中的是對陶淵明的源流及其作品的評價。如橋川時雄的〈陶淵明文學源流探索〉（《人文研究》第5卷第6期，1954年）和小笠原博慧的〈隱士詩考——說陶潛出於應璩考〉（《國學院大學·漢文學會報》1975年第21期）等等。

第三類是考證某個作家、某首作品的，如清水凱夫考證上品「謝靈運」條中疑點的〈詩品·謝靈運條逸話考〉（立命館大學中國藝文研究會《學林》1988年11號）等。

第四類是比較研究。比較研究又分兩類：第一類是中、日文論之間的比較；第二類是中國同時代及不同時代的比較。多為有影響比較。第一類比較如太田青丘的〈六朝詩論與古今集序〉（日本《中國學會報》第二冊）以及小澤正夫的〈古今集和詩品〉（《平安文學研究》1956年12月）等；第二種比較如：興膳宏的〈文心雕龍與詩品在文學觀上的對立〉（《吉川博士退休紀念中國文學論集》，1968年3月），荒井健的〈詩的喜悅——詩品與滄浪詩話〉（《中國文明選》13文學論集，1972年5月）以及中森健二的〈沈約與鍾嶸——圍繞對謝靈運的評價〉（立命館大學文學部松本研究室中國藝文研究會，1983年7月）等。

第五類是書評。如高松亨明〈關於最近詩品研究的評論〉（《弘前大學人文社會》第35號·國語國文學篇第五號，1965年）、入矢義高〈評高松亨明詩品詳解〉（《中國

¹³ 參見伊藤正文：〈日本研究中國文學的概況〉，《文學遺產》1982年第3期。

¹⁴ 見《詩品詳解》著者高松亨明教授致筆者函。

¹⁵ 曦仲譯。見王元化（選編）：《日本研究文心雕龍論文集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3年）。

文學報》1961年4月)以及釜谷武志《評高木正一譯注鍾嶸詩品》(《中國文學報》第30號,1979年4月)等。評論出版的著作,指出其不足,供後來者借鑒。

讀這些論文,可以知道日本學者的《詩品》研究,相當深入。

研究方法之啟示

從以上的介紹中,我們可以發現,在研究方法上,日本學者有兩個鮮明的特點:

一是「團隊研究精神」,對一部《詩品》,他們幾乎竭盡全力,把這方面的專家組織起來,利用集體的力量。二十多位專家分工合作,各從自己最擅長的角度,對《詩品》的某一方面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。如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家、作品和自然觀有獨到之見的小尾郊一專門研究《詩品》中「詩人的系統」;精通中國哲學的福永光司從哲學角度研究《詩品》中的「基礎概念」和理論範疇;對中國文字學、神話學、美學享有盛譽的白川靜從《詩品》的名詞術語研究中國「六朝審美意識的發展」。可謂奇文共賞,疑義相析;相輔相成,百密不疏。

從立命館大學的《鍾氏詩品疏》、興膳宏的《詩品》,到高木正一的《鍾嶸詩品》,都與這種研究方法有關。上述的成果,都是這種研究方法直接和間接的產物。團隊研究的方法,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效果。

二是「世界眼光」,通過上述的鳥瞰和分析,我們發現,日本學者具有某種世界眼光,即他們在研究中,不僅縱向吸取本國學者的研究成果,還橫向吸取了中國學者和韓國學者的研究成果,特別是吸取了張陳卿《鍾嶸詩品之研究》、陳延傑《詩品注》、古直《鍾記室詩品箋》、許文雨《詩品釋》(《詩品講疏》)、葉長青《詩品集釋》、杜天縻《廣注詩品》、車柱環《鍾嶸詩品校證》、《鍾嶸詩品校證補》中的精義。

這種世界性的眼光、新的研究意識和「團隊研究精神」,都給我們以方法論上的啟示。

Shipin Studies in Japan

(A Summary)

Cao Xu

This article is in four parts. Part one deals with the *Commentaries on the Shipin*, which marks the beginning of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*Shipin* since the ninth century. Part two introduces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“*Shipin* Study Group.” Part three is a general survey of contemporary *Shipin* studies in Japan, in the areas of textual criticism, commentaries and scholarly publications. Part four concludes with reflections of how Chinese scholars can draw from the Japanese experience: (1) worldwide perspectives; (2) new concepts of research; (3) teamwork spirit.